第一章　社会进步要以文明为标志

在引言中，我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区别作了说明，尤其是对文明概念的科学含义作了阐述，这虽然使我们对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但还不能说是在论述本书的主题。这一章，我们要直接进入本书的主题，具体和明确地阐发文明在社会进步中居何等地位。我们用“社会进步要以文明为标志”作本章的标题，表明了文明在社会进步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一、文明产生的历史启示和文明的“三维”视角

文明与社会进步紧紧连在一起，文明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和标志，文明也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文明时代或文明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才开始的。然而，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文明因素，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发展中已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原始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存在了几十万年。它自身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历史阶段。没有原始社会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人类也不可能进入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即奴隶社会。奴隶制的文明社会是原始社会文明因素积累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原始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太古时代，恩格斯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①]原始社会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是以文明因素为内容、以文明因素或文明成果为标志的。原始社会以其文明成果为以后文明社会的更高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长达几十万年的原始社会里，最受人注意、影响最大、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的是三个方面的文明成果（或文明因素）。

原始社会的文明因素或称文明成果，首先要推火的发现和应用。大约在一二十万年以前，人类对火的认识已经“发展到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②]。摩擦取火的发现和成功的应用，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成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真正敲开了人类文明的大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火的自觉认识和利用，大大提高了原始人的御寒能力，从而使人类能够生存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扩展了人类活动的领域；对火的自觉认识和利用，扩大了食物来源，改变了人们的食物结构和食物习惯，特别是使食物中肉类的比例明显增加，从而促进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尤其需要指出，对火的自觉认识和利用，促使制陶业和冶炼业得到了发展，于是引发了生产技术上的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和生产工具的发展。在人类生活和生产上由于火的广泛应用，迎来了人类的最早文明即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也与原始人对火的自觉认识和利用分不开，恩格斯曾这样说过：“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55、547 页。

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

对火的自觉认识和成功运用是原始社会首要的文明成果，它表明人类实践的积极成果总是以一定的文明表现出来的，文明成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深刻地启迪我们：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即表现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上。这里需要的是科学和技术。人类对火的认识和利用，是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运用的萌芽形态。唯有依赖科学和技术，人类才有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源问题不仅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它是一切生产工具的原动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条件。当前，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中，对现代能源的广泛发掘和有效运用，无疑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成果，是社会进步的又一重大标志。原始社会没有文字。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了绘画符号，这是文字的萌芽。文字的真正发明和使用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使用文字以前很久，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语言是原始人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集体创造的，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发展。人类语言的最初形式主要表现为手势语言符号，并辅之以简单音节的声音符号，以后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完整的声音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的产生和形成，使人的社会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有机程度（马克思、列宁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机体”或“活的机体”）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因为有了语言，人们就能互相发生联系，相互交流思想，进行交往活动。但是，语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的交流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传递的空间只能在听力所及的范围，相互交流的信息只能停留在记忆中。只有在有了文字以后，人们的交流和联系才超越了语言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丰富的实践能够被提高到理性的程度，并使之一代又一代人获得‘文化遗传”,知识和技术水平得到不断丰富和提高 同时也使人的精神生活得到新的发展。总之，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真正进入文明时代。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中国、埃及、印度等国之所以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与这些地区较早地发明了文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社会形成了以往所没有的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使人类文明除了物质文明以外又形成了精神文明领域。文明水平的提高、文明领域的扩展，是社会进步的深层次体现。重大的文明成果的产生，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从动物界脱离而成为社会的人，这是一次飞跃。人类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又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化科学技术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此有了神奇般的发展。文化既以文字为基础，又是文字的扩展。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文化教育，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从文字的社会功能和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中得到新的启迪。

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是原始社会发展中的又一重大文明成果，是社会进步的又一重大标志。原始社会曾发生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每一次社会分工，都表明人类文明的一次发展，人类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 页。

会的一次进步。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又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这次大分工后，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从事生产、只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并促使高利贷的产生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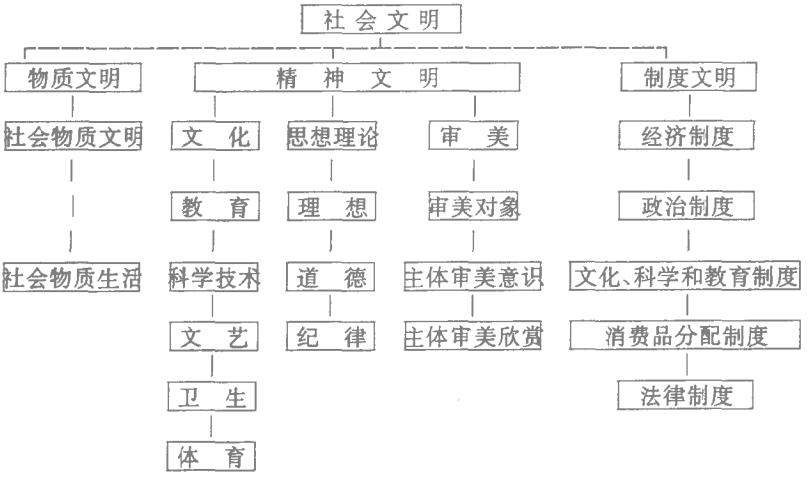
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促使人的知识技能专门化，也激发了人的竞争心理；分工加快和扩大了交往，使商品交换获得了发展；分工也使道德、法律的内容更新，制度文明也可以说是在分工基础上产生的。分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社会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人类社会的发展，固然最终要消灭这种固定的分工，不过那是遥远将来的事。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社会分工还将进一步精细和越来越科学化，也就是说分工将沿着越来越文明的方向发展。分工的日益科学化，不仅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的进步，也呼唤着道德、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建设。在现代社会中，要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须重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文明的全面建设。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将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人类文明产生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基本事实：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文明内容也是不断丰富的。特别是当人类文明经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文明概念的丰富性、整体性越来越得到凸现，这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明观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把社会文明看作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在内的社会整体性概念。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和许多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论工作者，从研究近现代的文明发展史，尤其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出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社会文明总体的三分法 即社会物质文明、社会精神文明、社会制度文明,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社会文明的这种内在结构，我们也可称之为社会文明的“三维”结构和“三维”视角。在文明三维的内在结构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最基本的，这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对应。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互相关系上，物质文明又是最根本的，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精神文明得以发展的根本物质条件。制度文明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也存在于精神生产领域，也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相联系的中介。但制度文明自身有明确和丰富的内容（在第五章中予以具体阐述），现将社会文明三维结构的具体内容以图表示之。



理论学术界将社会文明一般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三个方面，将制度文明单独列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这部广泛涉及“政治制度”、“国家”、“法律”、“权力的分开”与制衡、

“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政党”“选举权”等内容的著作提纲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等，它们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包括不了的。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前的文明社会时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①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各种管理制度，都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列宁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剥削制度相联系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质是“野蛮的文明”，必须予以抛弃；与社会大生产相联系的具体科学管理制度、科学技术，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属于进步的文明，必须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予以继承。列宁这里所说的，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作“野蛮”和进步的具体区分，而且也指出了社会政治制度和具体管理制度在社会文明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分析，把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共同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

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是以三维文明为基本内容的。它们也应当成为全面审视社会文明的应有视角。

二、文明：社会进步的天平

文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综合性、整体性概念。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标示社会全面进步的尺度不是别的，而是社会文明。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天平。社会文明的三维结构体系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以文明为尺度衡量社会全面发展或全面进步的整体性含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2 页。

社会文明之所以能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综合尺度，首先，是因为社会文明所包含的内容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反映的状况是一致的。社会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法律、道德等多方面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统一体。虽然其中有主要、次要之分，但是全面地考察一个社会的发展或进步，不能仅仅抓住其中的某一方面（即使是主要方面），应当既要看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要看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既要看由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又要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政治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上层建筑。人们知道，人类从原始社会步入奴隶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这一飞跃的标志，不仅仅是生产力,也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有了分工协作,而是包含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因素。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那是极其明显的，而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来看，那就会发生困惑，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合上，或者说从社会文明的视角即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这一整体上，才能说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其次，是因为文明是一定时代积极因素的积累和进步因素的综合。总的来说，一定的社会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本质特征的反映。如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即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所积累的积极和进步因素的总汇，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最一般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的社会文明，是社会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本质特征的反映，它不包括遗留于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种落后、消极、腐朽的东西。

第三，是因为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

同，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完善程度不同，还由于同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成熟程度不同，社会文明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和特征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以社会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整体统一作为衡量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综合尺度，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它是具有现实内容，各个社会又完全可以通用的衡量和检验的尺度。

第四，是因为只有强调以文明为尺度，即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稳定、健康的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上是上去了，但社会矛盾重重，两极分化悬殊，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和生机，其重要原因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没有协调和统一的发展。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受到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就是因为它较为重视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新加坡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而是较为注意社会文明的整体水平。它积极倡导儒家伦理文化，重视法制建设，培养国家意识。因此它克服了一些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未曾克服的矛盾，保持了社会文明发展的势头。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春巡视南方谈话时也这样说过：“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以文明作为社会发展或进步的尺度，其科学性、真理性是被实践证明了的。

时下，有一些学者提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或进步的综合尺度。应该说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离不开人的因素，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离不开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体现了人的社会化发展程度和人自身的智力发展状况。然而，应当看到把社会文明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的尺度更具有

科学性。这是因为社会文明不仅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因素，而且从本质上来说，社会文明是人发展的具体化。“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①]；“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②] 人也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从事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建设的具体的人。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人自身发展程度的现实表征。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推行的社会指标体系，可以说是社会文明具体化的一种数量表示。所以，用文明作为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综合尺度，既包含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尺度这个思想，同时又全面地反映了社会进步的现实的具体情况。马克思把文明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或进步的综合尺度，是“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是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③] 得出来的科学理论。

说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应如何理解？这确实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首先是着眼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紧迫性。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6000 美元增长到 18000 美元，发展中国家只从 150 美元增加到 350 美元。1991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56826 亿美元，中国则是 2482 亿美元。从产业结构来看，1870 年美国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占 52%，第二产业即工业占 24%，第三产业占 24%。我国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7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22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25 页。

1986 年,农业为 61% ,工业占 22% ,第三产业占 17% 。无论从产值还是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几乎要比美国落后一百年。这种国际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加快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不能不使我们充分利用目前难得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从国内来说，建国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长期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耽误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这就更加促使我们横下一条心,把经济建设搞好,把物质文明抓好。

但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绝不是单一经济增长论。从邓小平的多次论述以及从我国的现实实践状况来看，它强调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重视社会的全面进步，贯穿着社会文明整体跃升的深刻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既强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 1982 年 4 月 10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又指出了“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的四个方面工作,即“第一,体制改革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这四个方面包括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民风、党风在内的整个社会风气的全面发展或进步。1992 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时,他要求广东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并且着重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又阐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既要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包括社会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整体进步的概念。

要正确地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思想，必须要有社会文明的视角。在当前的现实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往往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下述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发展或单纯的经济增长，没有从邓小平同志的社会全面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发展。邓小平同志于 1985 年 3 月 7 日在一次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说：“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① 现在我们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这是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误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在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以后，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样理解和坚持发展的问题。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必须纳入社会全面进步的视野，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着眼于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②

另一个误区是，由于片面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因此也片面地认为只有经济建设或经济工作才是硬任务，而其他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建设都是软任务，因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一手硬、一手软或者是一手紧、一手松。我们有的同志之所以对抓生产、抓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0 页。

②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 年 9 月 28 日）。

经济建设很用劲,也很有决心和办法,但对抓精神文明等非经济因素方面的建设,总是兴趣不大,很少用心去抓,即使抓了也是碰到一点困难就束手无策,其原因之一,还在于他们把抓精神文明建设等非经济工作看成是‘吃力不讨好”,难以‘立竿见影”,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抓精神文明等非经济性工作，确实一时难以像抓经济工作那样较快地见到效果，而且有时其工作的难度和所花的精力还要超过抓经济工作，这是非经济性工作自身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决定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或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立场，我们就会像抓经济工作一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因为经济工作本身也不是孤立的只是经济领域的事，要搞好经济工作和促进经济发展，也必须要有精神文明等因素作保证。不然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也难以真正奏效。在现代社会，强调综合国力，重视人自身的多方面需要，要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和健康的发展，必须重视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显示社会主义自身的优越性，要向更高级、更文明的理想社会发展，我们必须自觉地、长期地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三、从经济发展战略到社会文明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作为社会进步标志的文明，不仅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文明成果，而是指包含诸文明成果在内文明整体。以文明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也就意味着社会进步并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进步，而是指社会的整体性进步。

人们对社会的发展或进步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发展过程,即有一个从单一、片面的尺度到综合、全面的尺度的认识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到社会文明的发展战略。

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观点（在现在还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认为社会的发展或进步，只要经济发展就行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就是基本上受这个观点指导并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经济技术决定论学派就是持这种观点。他们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因而经济发展也就成了衡量社会进步的单一尺度。在他们看来，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自然就富裕，就有了平均分配财富的前提，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民主化；而经济落后、民众贫困，往往是造成政府专制、社会不平等和政权频繁更迭的根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量事实表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其结果往往是‘有增长而无发展”。60 年代期间，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是很突出的,但到 60 年代末人们日益感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单纯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进步。因为在经济增长、某些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期望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日趋频繁，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要求也突出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和各种权力机构建设不健全，没有正确的舆论引导，也就没有能力去满足民众越来越多的要求，民众的不满就会导致动乱，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稳定。另外，由于片面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人们的精神生活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单一经济增长并不是衡量社会发展或进步的科学尺度。

从 70 年代起，研究社会发展的许多学者把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准从单一经济增长尺度转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尺度，日本社会学家驹井洋提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五个价值前提便是一例，他指出，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现实情况表明，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施惠予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并不能使他们的生活待遇、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所改善。因此他提出了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五个价值前提即平等、根除贫困、确保真正的人类自由、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民众参与决策。以后，不少学者和一些国

家的决策者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也越来越感到单一经济增长尺度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因此越来越注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综合因素，强调社会发展诸因素的互相协调和社会大平衡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F·马约尔说得好“：在今天，发展的概念本身被看成是一个更加完整的和具有多种联系的过程，它包括着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以及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因此，“发展应该被看成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文化的……它必须具有一种综合的特点，即包括社会生活的多种表现形式，并符合植根于各国人民的历史财富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目的。”现代化是当代世界的历史潮流。现代人也越来越感到现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工业化，也不完全等同于经济的高速增长。现代化应该是被看作是当代的社会文明形态。现代化首先或综合的表现是社会文明的总体进步。

以社会文明作为社会发展或进步的综合尺度的社会文明发展战略，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相比，具有广阔性、综合性、时代性的特点。广阔性是指社会文明发展战略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文明发展战略时，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搞单纯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而是内涵着人文价值和文化含量，体现着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程度。综合性是指社会文明发展战略，不是把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看成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要求把社会诸要素、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全面发展、统筹兼顾、系统协调的整体观。时代性是指社会文明发展战略不仅注重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也越来越重视非经济因素，重视法制，重视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化教育，重视社会道德，重视人的自身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把产值当成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为了追求单纯经济增长，可以不顾环境价值，不顾长远效应，不顾全局利益，甚至可以把人变成经济的手段。那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日益显示出其落后性。现时代

是重视人的发展的时代，只有社会文明发展战略即把社会文明当作社会发展或进步的标尺，才体现了时代精神，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从本世纪 60 年代开始，不少学者注意对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寻求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力图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来规范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可以说，这是人们 对社会发展或进步的认识向综合化、文明化发展的一种具体标志。

社会指标方法和社会指标体系的基本思想理论，首先是美国在 60 年代中期开始提出来的。1966 年美国国家工艺学、自动装置和经济进步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因素进行数量统计。这个委员会为此提出了测量“ 社会疾病 ”和建立社会需要指标体系的方法。同年，拉格曼·鲍尔出版了《社会指标》一书,他还引入了“ 社会指示器 ”这个形象的术语。《社会指标》一书认为“ 社会指标是制定社会规划和进行社会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统计指标对现状和未来作出估价，对具体计划进行评价,并确定它们的影响 ”。到 70 年代,已有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世界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积极开展了社会指标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80 年代,全世界已有 80 多个国家建立了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非经济因素，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综合因素的考察，也是从社会发展多种因素的视角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尺度。联合国的社会指标体系就有 13 个方面 140 个指标，对每个指标再加以细分就有上千个。设在巴黎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立的社会指标体系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它包括 15 个领域 33 个指标。15 个领域是寿命、生活健康情况、教育设施的利用、文化程度、就业机会、工作生活质量、时间利用、居民收入分配、财富、居住条件、服务设施、环境公害、自杀率、危险事故、人身安全威胁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由于存在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的社会指标体系除经济因素外，虽然也包括了许多非经济因素，但其主要方面是经济因素，在非经济因素方面，主要是一些诸如犯罪、自杀等现象性的社会问题，精神生活因素方面相对来说较为薄弱。这大概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既需要强调经济因素，又需要十分重视精神、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衡量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体系应当是既能完整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又能反映人们主要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包括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民主法制、环境、社会安全、社会参与等方面。总之，这一社会指标体系能从整体上以量化形式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趋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